

異鄉人

Guangdong Selected Poems of Young Poets From Other Provinces

GUANGDONG SELECTED POEMS OF YOUNG POETS FROM OTHER PROVINCES

Guangdong Selected Poems of Young Poets From Other Provinces

GUANGDONG SELECTED POEMS OF YOUNG POETS FROM OTHER PROVINCES

Guangdong Selected Poems of Young Poets From Other Provinces

GUANGDONG SELECTED POEMS OF YOUNG POETS FROM OTHER PROVINCES

广东外省青年诗选

Non-natives

黄礼孩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I227/268

2007

广东外省青年诗选

黄礼孩 主编

異鄉人

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乡人

黄礼孩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360-5010-5

I. 异… II. 黄…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8379 号

责任编辑 申霞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3.25 1 插页

字 数 334,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谢有顺

一

应该为诗歌说一点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小说可以畅销，散文可以名世，话剧可以成为政府文化项目，批评也可以寄生于学术场，惟独诗歌，一直保持着边缘和独立的状态。没有市场，没有版税回报，没有文学权力的青睐，它坚韧、纯粹的存在，如同一场发生在诗人间的秘密的心灵游戏，有些寂寞，但一直不失自尊。我见过很多的诗人，他们大多以人生作文，以性情立世，热爱写作，尊重汉语，对诗歌本身怀着深切的感情，即便遭到旁人奚落，内心也不为所动，常为自己能觅得一句好诗喝酒、流泪。在这样的时代，还有这么多贵重的诗心活跃在生活的各个角落，确实令人感动。相反，小说虽然热闹，但越来越像俗物，有些甚至还成了混世哲学的传声筒。我见过很多小说家，他们聚在一起，几乎从不谈论文学，除了版税和印数，话题无非是时事政治或段子笑话。这和诗人们的生存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无意于在这种生存状态之间分出高低。我只是想说，细节会泄露一个人的内心，正如圣经所言，“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心被物感之后，写作岂能不受影响？一个日益平庸和粗鄙的时代，势必产生平庸和粗鄙的写作；这个写作大势一旦形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就诞生了。

今天许多中国人正走在这条路上，作家们也普遍被这道洪流卷着走，缺乏自省，作品多为一时一利而写。无病呻吟，心如坚铁，自我复制，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通病，尤以小说、散文为

甚。如果作家没有了悲伤和愤怒，没有了灵魂的失眠和不安，如果文学不再是有感而发，不再对人世充满理解之同情，写作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中国古人讲人如其人，知人论世，所谓“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这都是老调重弹了，今天却有重申的价值。不能奢望从一颗斤斤计较的心灵里会产生出广阔的文学，正如不能梦想伟大的作品会从浅薄的游戏精神中生长出来。一个时代的写作总是和一个时代的灵魂状况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越过写作者的灵魂图景奢谈文学，这不过是另一种精神造假而已。

文学应该向我们展现更多的信念和诚实，从而告别虚假和平庸；面对触目惊心的心灵衰败，作家们应该尊灵魂、养心力，积蓄健旺、发达、清明的生命气息，来为写作正名。在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进行一种无关痛痒的写作，不过是在浪费生命而已——要意识到这一点，需要作家们有一种写作的胆识，真正在文学上精神成人。“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木心语）这话是很深刻的。没有精神成人，写作就如同浮萍，随波逐流，少了坚定、沉实的根基，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势必像洪流中的泡沫，很快就将消失。

诗歌总是不断地对这种生存境遇提出抗辩。我当然知道，诗人中也有玩世之人，迹近胡闹的写作更不在少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正是当今诗坛的生动写照。但是，相比于其他领域的写作，诗人中有着更多的理想主义者，诗歌也比其他文字更纯粹，更真实，更见性情。文学已经落寞，诗人的激情依旧。真正的诗歌，不求时代的怜悯，也不投合公众的趣味，它孤立的存在本身，依然是了解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证据。

我甚至认为，这些年的文学，最热闹的是小说，成就最大的当属诗歌。很多诗人，穷多年心力，就是为了探索如何更好地用语言解析生命，用灵魂感知灵魂，这多么难得。当小说日益简化成欲望叙事，日益臣服于一个好看的故事这个写作律令，很多诗歌却仍保持着尖锐的发现，并忠直地发表对当下生活的看法。许多新的话题，都发端于诗歌界；许多写作禁区，都被诗人们所冒犯。诗人是受消费文化影响最小的一群人，风起云涌的文化热点、出版喧嚣，均和他们无关，他们是社会这个巨大的胃囊所无法消化的部分，如同一根精神的刺，又如一把能防止腐败的盐，

一直在时代的内部坚定地存在着。优秀的诗人，总是以语言的探索，对抗审美的加速度；以写作的耐心，使生活中慢的品质不致失传。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孤独的个人”，使我对诗歌一直怀着一份崇高的敬意。

在虚无主义肆意蔓延的今天，诗歌是“在”和“有”的象征。存在缺席时，诗歌在场；别人失语时，诗歌发声——理想中的诗歌总是这样。诗歌是诗人真实性情的流露，是诗人生命的自然运转和发挥；它为此在提供注释，为当下想象未来；它为生命的衰退而伤感，为灵魂的寂灭而疼痛。诗歌的存在是要告诉我们，在俗常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在凝固的精神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精神的可能。“吾青春已逝/国家依旧年轻/少年们日夜加班/赶制新的时装/老同志老当益壮/酝酿新的标语/啊人民 继续前进吧/吾一人独自老迈/落伍 腐朽/读《论语》诵唐诗/韦编三绝 绝处逢生/在自己的秋天/蜕化为古人”（于坚：《便条集》），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世界为什么不是一个梦想/请给我们看看那真正的容颜”（东荡子：《鸟在永远飞翔》），这是一个生活疑问。“我在五金厂，像一块孤零零的铁”（郑小琼：《水流》），这是一种生活状态。在这样的诗歌中，我能分享到一种自己生活里所没有的经验和感受。因此，我常常在想，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了诗歌，我们到底会失去什么？毫无疑问，经济不会受其影响，社会秩序也会照旧，大家照样工作，照常生活，正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会因此而有丝毫变化，但我们能不能由此就证明诗歌是无用的、多余的？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嘲笑诗歌的力量，正是源于对一种多余的、私人的、复杂的经验和感受的剿杀，好像一切没有实用价值和传播意义的微妙感受，都不应该存在。这个以诗歌为耻的时代，正被一种实用哲学所驯服，被一系列经济数据所规划，被冷漠的技术主义所奴役。而诗歌或文学的存在，就是为了保存这个世界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它所强调的是，世界除了我们所看见的那些，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关乎理想、意义，关乎人心的秘密和精神的出路。离开了这些个别而丰富的感受，人类的灵魂世界将会变得粗糙僵硬，一片荒凉。诗歌反抗精神的

一致性，它激发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存着梦想和希望，因此，有多少个诗人就有多少种诗歌，有多少种诗歌就有多少种生活的可能性。试想，如果没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样的诗句，我们怎能领会汉语的壮阔？如果没有陶渊明，我们怎能想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一种高迈的人生境界？

——这并不是对诗歌价值的高估，而是借此重申一种诗歌独特的品质。诗歌在今天遭到时代的冷落，试图用投合公众趣味的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处境已经无济于事，诗歌的出路在于退守，在于继续回到内心，发现和保存那些个别的、隐秘的感受，继续做时代的刺和盐。诗歌不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多。钱穆先生说：“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

诗人要为另一种人生、为更多的生活可能性，站出来作证。因此，面对诗歌，诗人们不仅是去写作，更是去发现，去生存，去信仰。

意识到这一点，诗歌境界会变得开阔，写作也会往前走一大步。美国学者马克·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一书中说：“哲学家是精英中的一员，而诗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众人中的一人。”这可以看作是对诗人精神身份的一种恰当描述。诗歌的“民主”，在于每个诗人都是“一人”，但这个“一人”必须是“众人中的一人”。说句实话，我现在越来越厌倦那种无视“众人”的小圈子话语游戏——经过这些年一次又一次的诗歌革命，用语言撒娇，或者用诗歌写隐私，都是肤浅的诗歌行为，不值得惊奇了。诗歌发展到今天，应该出现一个更广大的整体性变革的图景，局部性的修补或变革，意思已经不大。但是，越来越多的诗人，正躺在现成的语言成果里享清福，没有多少人注意，诗歌在今天正发生哪些整体性的、秘密的变化。

最为根本的变化，在我看来，是文学精神气息的流转到了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

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生命气息的。唐代的诗人，生命力普遍是健旺的，他们诗歌里面的精神气场也强盛。李白等人的诗不是在书斋里写的，他们一直在生活，在行动，他们的诗歌活在生活之中，活在人生这个广大的现场里。陈子昂写《登幽州台歌》，李白写《登金陵凤凰台》，杜甫写《登高》等诗作，都是身先“登”而后心有所感写的。他们的诗歌疆域和生命疆域一样广阔，所谓“盛唐”，实在是生命之“盛”。诗歌后来一步步地走向衰微，跟国人生命气息的流转不断走向孱弱有关。“五四”时期诗歌再次勃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盛极一时，这何尝不是跟思想解放运动使个体生命变得神采飞扬有关？此为诗歌发展的大势，个人的力量无法逆转。到九十年代，诗歌又一次沉寂，直到九十年代后期网络普及，私人经验、身体细节大量入诗之后，一种由欲望和宣泄为主导的诗歌热潮才再次席卷全国。在此之前，文学被思想、文化、知识压抑已久，大诗、史诗、宏大叙事、个人命运感等观念一统诗坛，在这个背景下，强调身体之于诗歌写作的革命意义、强调身体话语在文学写作中的合法地位，具有重要的价值。当时我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就叫《文学身体学》，这算得上是比较早的研究身体叙事的文章了，引用的人很多。我在文章中说，“害怕面对人的身体的文学，一定是垂死的文学；连肉体 and 身体的声音都听不清楚的作家，一定是苍白的作家。”这个观点，直到今天我仍旧坚持。但我同时也意识到，当诗人们把书写身体经验迅速变成一种新的写作潮流之后，必将导致另一种危机：对身体美学的简化。很多的诗歌，充斥着肉体的分泌物、过剩的荷尔蒙、泛滥的口水……这些其实并非真正的身体写作，只不过是肉体（被简化的身体）的表层抚摩而已，如马尔库塞所言：“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这个时候，诗人们写的不再是健全的身体，而是肉体乌托邦。我认为，“肉体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力，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肉体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权力，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虽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特里·伊格尔顿

语)，但是，一旦肉体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权力时，它同样可怕。身体专制的结果是瓦解人存在的全部真实性，使人被身体的代替物（以前是“仁”、“志”、“政治”等，现在是性、肉体 and 欲望）所奴役。”事实果然如此。

现在看来，诗歌光有个人经验、身体细节的摹写是不够的，它最重要的是要解析灵魂、直抵人心。不是说，诗歌不能写隐私，不能写身体，而是要看诗人写的是什么样的隐私和经验。前一段读到木心的一句话，他说：“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其实，诗歌又何尝不是“光明磊落的隐私”？“隐私”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光明磊落”强调的是经验的公共性和精神性，二者的结合，才是诗歌的正途。今天，写隐私的诗人很多，但能写出“光明磊落的隐私”的诗人太少，为什么？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诗歌界缺少在精神上真正光明磊落的人，或者说，他的写作缺少光明磊落的精神视野。所谓光明磊落者，一定是有健全的精神维度的人。健全才能广大，广大才能深刻。

我深深地觉得，欲望书写的时代正在过去，诗歌的生命流转，开始往精神上走了。这是今日诗歌发展的大势。我这样说，并非要为今日的写作提供精神意义上的解决方案，而是要提示诗人们看清诗歌精神的流转业已开始，不能再依靠固有的惯性往下写了。过去一些年，很多诗人都成了身体经验、欲望话语的书写者，尤其是年轻诗人，凡写作，没有不写身体和欲望的，除此以外，诗人似乎没有多少东西可写了。当思想泛滥，我讲文学的身体；当身体泛滥，我却要重申灵魂叙事了——这不是故意的摇摆，而是我警惕、反抗任何一种文学惯性；正是惯性，使诗人的创造性日见衰败。

灵魂叙事大放光芒的时代已经来临。诗歌光写身体和欲望是不够的，它还应是人心的呢喃，它还要倾听灵魂在这个时代被磨碾之后所发出的痛楚的声音。我相信，这个时代生命气息的流转走到了这一步，因此，有必要在此重申灵魂叙事，重提一个诗人的责任——最基本的词语的责任和精神的责任。我知道，很多诗人都会以“写作是个人的事”为由，逃避写作该有的基本责任。“写作是个人的事”本是一句很好的话，但今天已经成了诗人们

放纵自己的借口。个人的事，如果不连于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它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也是面对公共世界发言的。这二者并不矛盾。萨特在《文学是什么？》里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个人创造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诗人的理想境界。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苦难和眼泪还如此普遍，恶势力还如此强大，面对这些，诗人和作家如果普遍沉默，拒绝担负写作在个人心灵中的责任，这样的写作，确实很难唤起别人的尊重。

因此，萨特提倡作家们“介入”时代，但这样的“介入”，并非简单的社会运动，而是要求介入者首先是一个存在者，在“存在”里“行动”，才是真正的“介入”。艾利斯说的“内心谈话”，萨特说的“存在”中的“介入”，如同鲁迅所说的要作“韧战”准备的忠告一样，其实都可借用来解释诗歌写作。这表明诗人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诗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只有这样的诗，才是存在之诗，灵魂之诗。

三

我愿意在这个背景里看黄礼孩主编的《异乡人》一书。在此之前，黄礼孩策划的《出生地》，作为广东本土青年诗人的诗选，出版之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这本《异乡人》，是广东外省青年诗人的诗选，它和《出生地》一道，共同向我们描述了广东青年诗人群体的庄重面貌。这两本诗集的出版，在广东诗歌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我在《出生地》一书的序言中说，“把写作当作出生地对他们的馈赠，这是出版创意，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

话题”，同样，把生活在广东的外省诗人用“异乡人”名之，也不仅仅是一种籍贯身份的归类。事实上，每一个诗人身上，都兼具“出生地”和“异乡人”这两个心灵标记。写作既是精神的远游，也是灵魂的回家。你在故土的根须扎得越深，你的心就越能伸展到远方。你走得越远，回家的渴望就会越强烈。因此，诗人都有两个家，一个家在故乡，叫“出生地”，一个家在心里，叫“异乡”，诗人的写作，是在这两个家之间奔跑和追索。不可能离开，也不可能回去。你此刻在家就永远在家，你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诗歌永远是不知道的，在路上的。

卡夫卡说，“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这是他为现代人画出的生存地图。天堂就是终极的家乡，“无法回去”则决定了人只能“流离飘荡在地上”，只能做一个永远的异乡人。由于人类远行太久了，家园的记忆已经淡漠，回去的道路也已经衰朽，我们一切的生存努力，都不过是在时间里，在天堂和尘世之间挣扎而已。真正的诗歌，既是朝向天堂的沉思，也是面对死亡的讲述。到二十世纪，诗歌更是成了人类破败人生的记录和见证——都是伤口，充满绝望，不可能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记不清是谁说过，“我们不得经过这么多的污泥浊水，不得经过这么多的荒唐蠢事才会回到家里，而且没有什么作向导，我们惟一的向导是乡愁。”——幸好还有“乡愁”，它成了现代诗歌中最为温暖的情感色调。但《异乡人》一书的精神核心，并非“乡愁”，或者说，“乡愁”已经内化到了每一个诗人的心里，它不言而喻。这些大地上的异乡人，更多的是关注此在，关注身边的生活，关注脚下这块变化中的土地。他们是想通过自己的写作，重新唤起人们对当下生活的巨大信任和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想象。因此，我赞同黄礼孩对这一群诗人的概括：“诗人是带着灵魂漫游的异乡人，他们在哪里，哪里便是诗的现场，诗的故乡。诗人作为大地上深怀悲悯的人，最大限度地敞开了心灵，更有耐心更有情怀更有力量地去关爱社会、关注人生，并以平凡人的人性光辉去爱整个世界。诗人的存在是用诗歌去见证并影响自己的时代。”

——这正是我要特别指出的《异乡人》一书的意义所在：这些诗歌，这些来自生活现场的心灵草稿，是解释人与诗、诗与时

代之关系的重要材料。阅读《异乡人》让我惊讶，在商业化程度最高、在身体解放最彻底的广东，还有这么多人用诗歌守护着灵魂的羞涩和自尊。在别人愤怒的时候，他们同情；在别人悲伤的地方，他们祝福；在众人都沉默的时候，他们抗议；在身体自渎的时代，他们为灵魂伤怀。未必每个诗人都是优秀的，未必每首诗都是好的，但把他们集合在一起，还是展示出了一种强悍的力量。面对比个人强大得多的现实，面对这个时代日益复杂、混乱的经验，这些来自外省的广东诗人，散落在办公楼、出租屋或工厂、车间里，如同隐藏在现实内部的敌人，随时准备站出来为这个时代的丰富和荒凉作证。

这些人理应受到特别的尊敬。

入选《异乡人》这本诗集的诗人，有东荡子、郑小琼、余丛、老刀、凌越、阿斐、宋晓贤、莱耳、杨子、谢湘南、王顺健、方舟、李明月、欧亚、杜绿绿、肖铁、安石榴、梦亦非、潘漠子、卢卫平等人，他们远不是广东外省青年诗人的全部，却毫无疑问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部分。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广东，面对一段同样壮阔的历史进程，他们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在广东，没有诗人愿意对生活取旁观的态度，他们都活在具体的生活中，被具体的生活所裹挟，也被具体的生活所塑造。他们即便对生活提出抗议，这个抗议也一定是温和的。这些诗人，普遍对此在生活有一种强烈的热爱，为此，他们所出示的理想，也不高蹈，而是有着结实、人性的面貌。他们在广东这块独特的土地上，用诗歌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这种声音不同于政府工作报告，不同于媒体报道，甚至不同于街谈巷议，它是诗人关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意见。在我看来，要理解真正的广东，这份诗歌意见不容忽视。

谁都知道，这三十年来，广东发生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奇迹，国人多有论及，而由此产生的数以千万计的移民，将对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造成多大的影响，却还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这么多人同时在中国大地上迁徙，他们中的多数人又都选择南下广东，在这里工作，生活，扎根，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盛大景观。广东以极大的包容精神，接纳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她的生机和混乱也由此而来。很

显然，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希望和绝望交织的时代，一个高尚和污秽混杂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作家，能做些什么呢？在广东，小说并未成为时代的强音，配得上这个时代的小说，太少；散文多是一种书斋生活或优雅的抒情，看起来更像是时代的装饰；相比之下，诗人们在时代面前显得更加敏感，更加尖锐，和现实短兵相接的写作也不在少数，尤其是那些来自省外的“异乡人”，他们的介入和书写，为命名这种大变动中的生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四

这挤满了人的广场是多么荒凉！

他们都有一个身份，

纨绔子弟，傍大款的美女，公交车上的小偷，天桥下的拾荒者，

法律顾问，营养专家，家庭主妇，化妆品和春药推销员，五星酒店厨师，

地下通道里的流浪歌手，退休工人，古典音乐、女权运动和长跑爱好者，

警察，司机，清道夫，士多店老板，

他们都有一张脸，一个口音，和一些癖好，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活在哪个朝代，

所有的人，

衣衫褴褛者和西装革履者，

大腹便便者和骨瘦如柴者，

滔滔不绝者和沉默寡言者，

狼吞虎咽者和素食主义者，

全都那么惊慌，那么笨拙，

他们对着镜子叫不出自己的名字，

对着孩子说不出斩钉截铁的誓言。

——杨子：《这挤满了人的广场是多么荒凉》

这像是广东某个广场的真实写照，又像是新移民生活的象征性图景。那么多的人，不同身份的人，混杂着挤在一起，说出的却是“荒凉”二字——这首诗对当代生活的精练概括，在我看来，甚至超过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杨子在另一首诗中还说，“那么多滚烫的欲望/压在一座灰色的大桥上，/加上咫尺之遥的银行、商场和夜总会，/加上那些紧贴在一起又无比疏远的心，/名字就叫——荒凉。”（《荒凉》）除了“荒凉”，广东最著名的还有这样一种生活：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
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
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
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
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
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
——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

——郑小琼：《生活》

在五金厂工作，人就像“一块孤零零的铁”，这是何等深切而又个别的经验。这令我想起卢卫平笔下的“玻璃清洁工”，“最底层的生活/怎么要到那么高的地方/才能挣回”？类似的表达，在过往的诗歌中，我们不常读到。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底层本身。一个有切身之痛的人所写的生活，有别于其他人的虚构和想象，它的存在，记录下的是这个时代最容易被消灭的渺小的声音。假如这个声音不在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出现残缺。

许多的广东诗人，都写到了这种异乡人的日常生活。除了诗人，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群体，会对这些碎片式的经验抱以如此巨大的书写热情。我一直喜欢读这种小视角的、有真实生活气息的诗歌，包括更早以前读到的杨克的《天河城广场》和《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令人印象深刻。《异乡人》一书中，这一

类好诗还有不少，遗憾的是，限于篇幅，我无法作更多的引述，也无法对每一个人的诗歌进行阐释。我当然知道，来到广东生活的异地诗人，他们的写作所关注的远不止这些（比如宋晓贤的《月光症》，“一个人病了/他得的是月光症/在有月亮的夜晚/他就发病/独自在月光下 哀鸣/这病多美啊/我都有点跃跃欲试了”，也是对人心生活的一种描述；比如李明月的《成为你的最初》，“一个人经过怎样的火候/才能把内心的阴暗蒸发/怎样的脱胎换骨/排毒 才能改变肉身的质地/过好红尘中清淡的日子”，也表达了一种内省的生活向度；比如莱耳的《无题》，“你的脸上，有一种遥远荒芜的表情/这使得今晚的月光，有了凉薄的意义/这苍白的，潮湿的/一朵，一生都不懂得愤怒，也不在乎枯萎的，茶花”，也未尝不是对生活精美的隐喻），但我重视他们对当下生活的讲述，重视他们笔下的语言与现实相互搏斗时所留下的痕迹，我相信，这是广东诗歌中最特出的部分。

我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广东诗人有着别地方诗人身上所罕见的忠直和冷静，仁慈和宽广。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的许多诗人，在骨子里其实并不爱这个时代，也不喜欢现在这种生活，他们对人的精神状况，更是缺乏基本的信任，所以，在他们的诗歌中，总能读到一种或隐或现的怨气，甚至是怨恨。而诗人心中一旦存着怨气，他就很难持守一种没有偏见的写作。这令我想起胡兰成对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的批评。苏东坡与王安石是政敌，两人相见时的风度却很好，但胡兰成说，“林语堂文中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苏与王二人有互相敬重处，而林语堂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在当代文学界，“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式的写作，何止万千？我说杨克的诗歌中，有一种单纯、仁慈的东西，就是赞扬他的诗歌里没有对生活的怨气。其实，广东的很多诗人，都能像杨克一样，对生活取仁慈的看法，他们心中能不存怨气，原因就在于他们还有爱，他们对生活还有一种信任感。怨气使人变得窄小和计较，而仁慈却通往宽容和饶恕——它种写作伦理，在今天值得特别珍视。

过去，我们常在一起聚会，

铿锵的声音要多于梦呓，我的朋友说：

“需要时代的有力的发言。我的诗篇

无一例外都是源于生活的歇斯底里。”

现在我改变了想法，

我更喜欢安静，

下午的安静、文字的安静、床上的安静。

——凌越：《虚妄的传记》

从“歇斯底里”走向“安静”，从怨恨走向仁慈，这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一种生活的勇气。安德列·纪德在《人间粮食》中感慨说：“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诗人也需要努力，需要在热爱中往前，从而看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比道德更高的精神核心，存在着一个超越善恶的伦理境界，看见在天地之间，一切都本于尘土，又将归于尘土，“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看见这些之后，你心中还有何可恨？

大地将把一切呼唤回来

尘土和光荣都会回到自己的位置

你也将回来，就像树叶曾经在高处

现在回到了地上

——东荡子：《树叶曾经在高处》

这就是一种清澈和澄明了。确实，《异乡人》不是那种沉迷于一己之私的诗歌选本，它有开阔、从容的风格。我同意黄礼孩的说法，《异乡人》“是这个时代的镜像”，从它映照出的，是一个时代的面影——这张面影的出现，为诗歌重新介入现实探索了一种可能。从“一人”走向“众人”，并不一定会演成新的公共写作，正如写作从黑暗走向光，也不一定就是一种精神的造假，重要的是，诗人必须重获一颗大心，诗歌必须在生活面前留下真实的刻度。诗人从身体话语走向灵魂叙事，诗歌从纸上闲谈重返现实，这不是对旧有写作的取消，而是对已有的写作边界的

拓展，对新的诗歌境界的打开。

我看重这样的努力。多年来，诗歌的路越走越窄，一方面是因为消费主义对文化的蚕食，另一方面也和诗人自断出路有关。所幸，广东的许多诗人虽身处异乡，但他们没有中断对梦想的追寻，没有熄灭自己对生活的热情，仍旧相信伟大的生活将继续滋养诗人的灵魂，相信诗歌创造的激情依然扎根于此，这就为他们在这个生命流转的大时代里重新出发，找到了坚实的精神基点。《异乡人》作为这一话语实践的见证，里面虽然隐藏着许多不同的诗歌路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每个诗人都想准确地描述出灵魂苏醒之后的现实。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我相信，那些能写出让人珍重的人世的诗人，他的灵魂一定是生动的。

2007年5月27日，广州